

异化翻译:陌生化的张力

李静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2)

摘要:以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认为:新时期中国翻译宜多采用异化,才能使中国在处于弱势文化的环境里构建起和强势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

关键词:翻译;异化;归化;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507-06

翻译有很多矛盾,核心的矛盾就是要处理归化异化的悖论。这对矛盾经常让译者顾此失彼,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归化异化孰长孰短?作为翻译策略似乎它们自身难辨优劣。倘以陌生化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会感到犹如走出低谷,多少有点云雾初开的感觉。

一、翻译的陌生化关照

翻译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门介于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它的发展更需要相关学科的关照。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因为它的工作对象是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翻译免不了要受到文学艺术有关理论的影响,原作所具有的文学性质在译语文化里也理应得到传达,不然,也难以称得上称职的翻译。因此,借鉴文艺理论中的陌生化理论进行翻译研究顺理成章。“陌生化”一词含有“使之陌生、奇特、不同寻常”之义。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是指作家、诗人创作手腕的新奇,使所表现的客体在接受者那里显得“陌生”,从而达到一种新鲜的美感。文学翻译作为译者的二度创作,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当然,“陌生化”不是专为翻译而提出,但翻译产品的产出和接受有着陌生化理论可以建构的意义之处。

其实,“陌生化”在翻译界已经不陌生。据刘英凯考证,这一术语原文是 *defamiliarization*, 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其著作中的一节“翻译的影响”中提出的^[1]。从翻译

的视角来考察,它应该指的是译者翻译过程中适度舍弃译语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让译语和读者之间拉开审美距离,也就是译语世界让读者感到“陌生”,以激活他们应有的接受能力和审美经验,以提高接受效果。就如同天天遇见的事物,偶然给人以新鲜感,是因为人们暂时脱离生活实用的约束,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上去观赏的缘故^[2]。翻译的陌生化之理就在其中。

具体说到翻译领域的异化,陌生化并不完全等于异化,但异化应该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陌生化。作为翻译策略,归化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而异化追求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以丰富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对译文“陌生感”的需求。异化旨在“让作者安居不动”,体现原作的“异国情调”,这样译者就要在译语文化里构建原作的异国特征。亚里斯多德说的好:“给平常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这样,异化的译文实际上就和译语读者之间构成了“距离”,造成陌生化,给读者以新奇的感受,再经过读者的终极性阅读,最终为他们所接受。

在中国,1995年,由上海《文汇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其中也包括读者对归化和异化的看法。虽有读者赞成归化的译文,但多数读者反对归化,认为:读者阅读外国文学原著译本,目的是通过译作欣赏原作特有的韵味、情调,若译文完

全归化,则不成为翻译。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林译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为什么还被人们传为笑话,也不再难理解林纾把莎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而因此被胡适判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究其原因,还应还原作本色,保留原作的“陌生化”。

二、异化:新时代的陌生化张力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而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就是确立差异。这恰是后现代理论的诉求。为此,能够带来差异,为民族文化输入新鲜血液的异化翻译显得异常重要。异化翻译给民族语言文化带来了“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到“陌生”,了解到他域的“长处”,促进文化交流,丰富语言,增强文化实力。而归化翻译法只能造成文化差异和自我的丧失,使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产生文化自恋,而意识不到“他者”的存在^[3]。请看下面两例。

唐朝诗人孟郊有这样一首名诗《古离别》,原诗末句中的“临邛”用了中化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典,体现了女主人公希望丈夫离别后不要在外另觅新欢,弃家不归的愿望。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原诗和译诗。

原诗:欲去牵郎衣,
郎今到何处?
不恨归来迟,
莫向临邛去!

译诗: You wish to go, and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re are you going - tell me, dear 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s your heart away.

莱彻(Fletcher)这首译诗虽然传达出了原作的主题信息和艺术信息,但未能再现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原文借“临邛”之典恳求丈夫不要步司马的后尘,而译诗尾句却矛头直指偷走丈夫的“偷心贼”。显然,这一归化变通的译文抹杀了原语文化的他异性和异质“他者”文化。再看王佐良先生汉译彭斯

(Robert Burns)的 A Red, Red Rose 一诗。

原诗: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re am I;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译文: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
请看我,多么真挚的爱情!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纵使大海干枯水流尽。
纵使大海干枯水流尽,
太阳把岩石烧作灰尘,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只要我一息犹存。

文学语言讲求陌生化的效应,在译作里,王先生为了保存原诗的陌生化效果,并没有把“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归化成汉语中早为读者所熟悉的陈词滥调“海枯石烂不变心”。“海枯石烂不变心”在译入语里早已成为“传统”,妇孺皆知,和读者无“距离”可言,带来不了什么新奇的陌生化之感。相反,倒是王先生异化的译文,“纵使大海干枯水流尽,太阳把岩石烧作灰尘”保存了原诗语言中的鲜活魅力和陌生性。

后现代理论要求翻译内容不断创新和突破,语言以及文体风格上不断分化和变异。理智地说,这也是陌生化张力的要求和体现。因为语言符号系统上表现出来的求新求异心理永无止境,只有用新的符号,表现方式和色彩,读者才会对译文的他异性在视觉、嗅觉、听觉或触觉上产生新的感受。也只有通过异化才能传递原语文本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保持陌生化的张力。归化翻译只会抹杀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看不到各民族的特殊性,最终导致封闭自我,成为井底之蛙,夜郎自大,文化自恋。异化翻译正是差异性能够存在,确保多元文化存在的可能。对于他文化所体现的差异性,译者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本着“他者即地狱”的考虑,用归化法消除“他者”^[4]。

傅东华应该说是极端归化的代表。他的译作颇

有罗马战胜希腊时把希腊作品任意归化的味道, 因为他在翻译《飘》时, 一方面把“陌生”的人名、地名“中国化”, 另一方面对一些描写性文字随意增删, 岂不是有点让读者把中国的十年内战当成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即使傅译弥尔顿的《失乐园》也采用了归化的手段, 用“半自由体”的译法, 把原诗的一行译出两三行, 把原诗的固定节奏在译文里的表达却是随意长短, 原诗没有押韵的韵角, 而译诗却有意识地押韵, “四字”成行比例也甚高, 所以不免赢得了“不为作者之所为, 却为作者之不为”的称号。

可以想象, 傅译用归化的手段, 改变了原作的形, 未必能有原作的效果了。相反, 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则追求借形传神的异化译法, 并取得了我国莎剧翻译和诗歌翻译的重大突破。卞先生独巨匠心, 用“汉语白话律诗”摹拟莎剧的素体无韵诗, 于1956年发表了《哈姆雷特》新译本, 取得了“形神皆似”的效果。由此他提出了翻译应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求‘信’”的主张, 并明确指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 翻译文学作品, 不忠实于原来的形式, 也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有的内容, 因为这样也就不能恰好地表达原著的内容”^[5]。

异化的本质就是在传达原作“陌生”文化思想的同时, 要尽可能兼顾原作“陌生化”的形。翻译要力求尽善尽美, 不可得“意”而忘“形”。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尽可能地译出原作“风姿”, 这就决定了译者不可避免要经常求助于异化手段。历史在进步, 时代在发展, 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在改变, 阅读审美情趣在提高, 了解异域文化写作手段的心理在增强, 倘若一味地或过多地归化就是“逆时局而动”了。

显然, 在译文中展现原作的“陌生化”特点应该而且已经提上了日程。译者作为“媒婆”, 总不能“隐瞒”原作的真相, 何况原作这个“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歌德就曾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 也许不无道理。试想仅用中国的历史典故“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就代替了俄国人的“拉的是孩子的手, 动的是孩子妈的脑筋”、英国人的“许多人都是因为喜欢保姆去吻孩子”、法国人的“贵妇人都是因为爱骑士而去吻他的侍从”和德国人的“吻的是孩子, 想的是孩子的妈”的别具特色的意象, 这样归化, 中国历史典故未免权力也太大了吧。

译作的陌生化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

在现时代的中国还有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平等对话的意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理应是处于平等的地位面对面的参与, 可由于历史上霸权国家向外扩展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进行殖民他国的同时, 也形成了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使自己处于文化中心地位, 对其他弱小国家的文化采取抵制, 甚至封杀的态度, 从而也形成了文化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对峙。事实上, 在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中, 各文化之间的参与都不是平等的, 强势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容易取得优势, 弱势文化则往往有失去自身特色, 被人同化的可能。强势文化由于比较自信, 轻视其它文化, 所以也就不大可能接受外语文本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任何成分, 因而更多地就会采取归化的策略, 而抵制异化的策略^[6]。霍克斯英译《红楼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红楼梦》中有很多“红”,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阳光、幸福、热烈、繁荣、喜气、闺阁等, 而在英语中却更多地与暴力凶杀和流血相联系, 所以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就用“绿”代替了“红”。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 Court of Green Delight, 怡红公子就成了 Green Boy。经崔永禄先生的研究分析, 这在霍译文中“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较普遍的, 有一定思想的”, 这“不仅是霍克斯一个人的做法, 其他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或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国家的作品时也有类倾向”^[7]。

这种倾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采用归化的策略, 拒绝弱势文化“陌生”之处的强烈过滤现象。这恰恰验证了韦努蒂的观点。韦努蒂认为英语的翻译自从17世纪以来就以“流畅翻译”, 即归化翻译为主流, 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8]。自从英美在政治经济方面在世界上取得领先地位, 其文化地位也随之上升起来, 英美的文学翻译就极少采用异化的译法^[9]。为什么会这样? 韦努蒂认为选择这一翻译策略的原因不仅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更重要的是因为两种文化不平等。弱势文化的“陌生性”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在文化不平等的状态下往往又体现着某种权力关系。塔拉尔·阿萨德认为, 文化翻译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陷于权力关系之中的“专业的、民族的、国际的”关系^{[9](42)}。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探讨文本实践的权力关系, 而文本实践又反映了较大的文化脉络中的权力结构^{[10](78)}, 强势文化和弱势

文化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关系。中华文化有很多精品,需要译者认真挖掘,在全球化的时代,把汉语的经典作品译成外语推向世界是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译者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争取异化;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则应退而求其次,进行必要的归化^[11]。我们主张比较多地采用异化的手段,特别是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要强调发掘他们的文化中优秀的东西^[7]。这对于塑造我们民族的形象至关重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或者说文化较量的舞台上,也该成为思想的航标和实践的准则。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保留中华文化的风采,展现中国文化的精粹,使之以应有的丰姿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异化翻译给我们的文化输出创造了平等的交流平台。

三、传统:陌生化的反叛

异化当然并非万能,“陌生”也要有度。我们主张用异化方式实现新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平等,但并非排斥归化,只是在归化异化的杠杆上找到合理的支点,掌握孰重孰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真理只要往前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同样,异化如果失度,就会走进绝对主义,这样异化不是真正的异化,只能是打着异化之名的“伪异化”。采取异化既要注意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接纳程度,也要注意目的语读者接受水平的限度,也即是说读者的视野期待能够和译文“陌生性”融洽的程度。这两点应该是我们奉行异化的翻译基础。

我们主张异化,尽可能传达原作的“陌生化”。异化其实也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概念。文学史表明,文学的发展是背弃传统的过程。中国的文化大门刚刚打开,外国文学作品刚刚译介到中国时,它的陌生应该有度。考虑到译语的接受环境,平衡的支点会离开作者倾向于读者,让读者“安居不动”。但随着读者阅读能力的提高,审美情趣的变化,原来有“度”的陌生成成了传统,自然也就要求更大程度的“陌生”。在翻译基础已经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新作翻译就要走近原作让作者“安居不动”,也就是要多异化原作的洋味,多生产些“陌生”。异化是变化的,这就是陌生化的张力之所在。

回顾一下中国的翻译之路,中国已有两千年的翻译历程,真正的文学翻译却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晚清。在这短暂的一百年的文学翻译里头一百年间大致以归化为主调,虽然其间也不乏鲁迅、瞿秋白、董秋斯等人力求传达原作“异质”的异化策略,但终究没形成大气候。近代中国严复、林纾、徐光启、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只是为了开启民智,主导思想观念是宣教启蒙,当然也带有唤醒民众、民族救亡的政治功能。1904年林纾译了《吟边燕语》,翻译才开始转向宣传文学性的时期。但这时的翻译主要还是改造同化型的翻译,不太注重吸收新的表现方法^[12]。这些改造同化型的翻译让今天新时代的读者们过于熟悉,感觉不到什么“陌生”,自然而然也该成为文学的传统,启发新的异化和陌生。从这一动态的意义上说,翻译文学更需要对原有的归化译文开展批评,赋予它们时代应有的积极意义外,可以适当地“查漏补缺”,建构新的陌生化意义。今天盛行的复译之风理应多考虑些原文的异化和陌生。

当然,我们也不能抛开社会环境纯粹地谈论翻译策略。翻译作为语言文化的转换活动,要受到社会的规约,这是不言自明的。韦努蒂从后殖民理论角度来探讨归化、异化,安德烈·勒菲费尔也把翻译置于宏观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归化异化的选择还牵扯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因素^[13]。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长期所处的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程度的限制等,都对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规约。但是,在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向国外学习科学文化的时期,异化的策略会更加适应这一时期的要求。另外,人们的文化素质较之封建时代普遍大有提高,懂外语的读者群体不断扩大,有了一定的外语基础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同时,更有对外国文化了解的需要,他们就不再只满足于译文的归化顺畅,而是要更多地了解“陌生”的异国情调。这两者作为译入语一方的文化参数(parameters)^[14]是对源语文化进行归化还是异化的有效依据。

由于时代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规约,同一原文采取不同的策略,译文就可能会备受宠幸或备受冷落。蟠溪子翻译的哈葛德的爱情小说《Joan Haste》由于采用了归化策略,甚至删除了有违于中国伦理道德标准的情节,结果其译文大受封建文人

的欢迎。仅仅几年之后,林纾的译文对原文未做任何删节,而是原封不动地将其重译,结果,林译文为此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恶毒攻击,林纾甚至被斥为传播淫贱之徒。译入语文化参数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规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倘若今天的读者再读林纾的这节译文时,难道还会骂林纾为传播淫贱之徒吗?这说明译入语文化环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在进步。所以也就召唤译者采用异化策略。

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多年来中国的翻译输入产出极不平衡。中国翻译总是输入的多,译出的少。比如,有人说“晚清的小说有三分之二是翻译”^{[15](192)}。实际上,中国文化不仅需要“请进来”,而且需要“走出去”。在某种意义上说,“走出去”意义更加重大。2000年1月4日《文汇报》也曾披露:“目前在我国的翻译领域中,引进与输出极不相称,大量的外国作品被译介到我国,西方思想文化界的新概念、新思潮、新理论国内‘追’得挺快,在不少学术领域我们对国外的了解几乎达到同步,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文化和哲学等领域有许多好的或新的学术成果,却没有及时介绍到国外,甚至中华文明史上的不少精华内容还未充分译介,这相当令人遗憾。”可见,中国更迫切需要改变“翻译逆差”,让世界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外国人翻译中国作品,未免会受到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左右,同化中国独特的文化。如前所述,霍译《红楼梦》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如科利瑞(Thomas Cleary)翻译的《论语》,他在译文的前言中称,为了使西方读者不至于被不重要的文化细节所困扰,对译文进行了较多的改动和删减。读科利瑞的译文就发现,好端端的一部文化经典,在他的笔下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与其说表面上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即使阅读方便,也不该做这么大的删减,让原语文化的异质之处蒙受损失,哪还有什么陌生化的影子?)不如说译者处于强势文化的位置,对原语文化任意删减。韦努蒂所指出的文化民族中心主义使然。从霍克斯和科利瑞二人的译本中我们很难看出他们对保留原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就是这种危险的做法,很不利于发扬中国文化。翻译中国书籍,虽不是中国翻译家的专利,但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拿起“异化”的武器,力争改变现代“南-北翻译的不平等”^{[16](139)}。可喜的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受到西方

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17]。试想,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远,现有的趋于平衡的两种策略必将会发生倾斜性变化。归化的译文很少传达陌生,必将论为传统,开启新的陌生,需要更大程度的异化。异化“如同一股潮流,不可阻挡,难以逆转”^[18],而且“当前的国际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国情、国策都为异化翻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

参考文献:

- [1] 刘英凯. 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J]. 外语研究, 1999, (3): 51-54.
- [2] 郑海凌. “陌生化”与文学翻译[J]. 中国俄语教学, 2003, (2): 43-46.
- [3] 刘军平. 超越后现代的“他者”: 翻译研究的张力与活力[J]. 中国翻译, 2004, (1): 12-17.
- [4] 吴南松. 翻译: 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对翻译差异性的保持问题[J]. 中国翻译, 2003, (3): 13-17.
- [5] 卞之琳. 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 1959, (2): 63-72.
- [6] 韩子满. 文化失衡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 2000, (2): 39-43.
- [7] 崔永禄. 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5): 41-44.
- [8]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9]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0] Bassnett, Susan & Harish Trivedi.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11] 孙致礼.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 (1): 32-35.
- [12] 吕俊, 侯向群. 谈翻译观念嬗变与对话意识的建立——兼谈新时期的翻译观[J]. 外语研究, 1999, (1): 41-42.
- [13] Lefevere,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14] Toury Gideon.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 Tel Aviv, 1980.
- [15] 周珏良. 周珏良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16] Richard Jacquemond.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Case of French-Arabic Translation[A]. Venuti Lawrence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 Ideology[C].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39-158.
- [17]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 2002, (1): 41-44.
- [19] 孙致礼. 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 中国翻译, 2003, (1): 48-51.
- [18] 徐丹. 文化融合中的语言翻译问题[J]. 中国翻译, 1998, (3): 2-5.

On the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an extension from defamiliarization

LI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Taken advice from the theory of defamiliar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n foreig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nd arrives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should be highlighted, which will help to build a workshop where China, with the identity of weak culture, can have an equal dialogue with strong cultures.

Key words: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extension; defamiliarization

[编辑: 颜关明]